

吴怀祺
洪认清
著
主编

中国史学
思想通史



近代后卷
(1919 ~ 1949)

黄山书社

中国
思想通史
学



近代后卷
(1919 ~ 1949)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近代后卷/吴怀祺主编,洪认清著.
- 合肥;黄山书社,2002.2
ISBN 7-80630-731-1

I . 中... II . ①吴... ②洪... III . 史学史:思想史
- 中国 - 近代 IV . 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6134 号

*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375 字数:350 千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定价(平):26.00 元
定价(精):34.00 元

作者简介

洪认清，男，1966年12月生，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人。1997年6月在华中师范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02年6月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近年来在《史学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学术月刊》、《求索》、《船山学刊》、《安徽史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十多篇，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中国经济史等。现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教师。

题记

吴怀祺

五四运动把中国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时期。新文化运动产生深远的影响，史学近代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古典史学或者说传统史学的命运，二是中国史学的发展大势。1930年，张荫麟追溯近代史学时，说：

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过去的十来年可算是一新纪元中的一小段落；在这十来年间，严格的考证的崇尚，科学的发掘的开始，湮沉的旧文献的新发现，新研究范围的垦辟，比较材料的增加，和种种输入的史观的流播，使得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时代顿成过去，同时史界的新风气也结了不少新的，虽然有一部分还是未成熟的果。^[1]

西方学者也注意到1919年中国史学的变化。杰弗里·巴勒克拉夫(Jeffrey Barraclough)说：“中国传统史学体系的崩溃如果不是从1905年开始的话，至少可以追溯到1919年。”^[2]他说的“传统史学体系崩溃”，与张荫麟说的“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时

[1] 《中国上古史纲·自序》，台北里仁书局1995年第6版。

[2]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21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代顿成过去”，意思一样，中国古典史学到了 20 世纪是终结了。古典史学的终结，首先是史学思想发生了变化。

——史学思想不再是与经学纠缠在一起。由于经学宣告了终结，〔1〕近代史学思想发生剧变，直接受到西方近代哲学的影响。无论是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还是章太炎的古文经学，再也不可能成为认识历史的指导理论。康与章曾是时代的弄潮儿，但不久，“各以不同的原因，成为时代的落伍者”。〔2〕

近代西方哲学思潮对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影响不可低估，在这方面主要有：

1、实用主义。杜威在五四时期来华宣讲他的实用主义，通过他的门人胡适的传播，中国近代史学受到实用主义的影响相当深。

2、实证主义。这股思潮对中国近代史学思想、对历史研究方法都产生了影响。

3、新康德主义。梁启超新史学理论变化的原因之一，是受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李卡尔特的学说影响。

4、新黑格尔主义。王国维史学思想来源之一，是新黑格尔主义。

5、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也是近代史学家如梁启超解释历史动因的依据之一。

西方史学思潮影响应单独提出来。西方的历史进化论传入

〔1〕 冯友兰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题为“经学时代之结束”。1992 年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作了详细说明，(香港)中华书局 1996 年再版本，第 180 页。

〔2〕 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第 24 页，(香港)中华书局 1996 年再版本。

中国,对中国史学思想影响特别大,这个理论被广泛应用到史书编纂中。再一个是鲁滨逊(James H. Robinson)的“新史学”思潮,在何炳松的史学思想中反映得十分明显。还有就是西方批判史学的影响。这体现在德国兰克及兰克学派对中国近代史学产生的影响,傅斯年史学思想深深打上了兰克史学的印记。此外,伯伦汉(Ernest Bernheim)的《史学方法论》以及朗克诺瓦(Charles V. Langlois)、瑟诺博司(Charles Seignobos)的《史学原论》在当时史学界产生广泛的影响。

面对复杂的西方学术潮流,中国史学家的反响不尽相同。有的学人接受多种西方学术思想,而少了自己的创造,还有一些学人不断地改变自己的面目,更换自己的旗帜。这种情况造成了学术上的博杂与多变。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外,有“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理论,有全盘西化论,有中国文化本位论,还有贺麟的主动“化西”论,等。但是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正确态度,应当是对中外文化遗产进行扬弃,进行批判吸收。

——近代的历史观和史法发生了变化。在历史观方面,古典史学的历史循环论、历史倒退论、天意史观,基本绝迹了。公羊三世说的历史进化思想等,已经为西方的历史进化论所代替。

——古典史学中的史法,如春秋笔法、正统论等历史编纂原则基本被否决了。史评更多的是关心民族的命运、历史的前途,不是为帝王争正统,更不是“诛乱臣贼子”。

——历史编纂形式的变化。古典史学的以纪传体史书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形式基本上退出了史坛。

中国古典史学适应了中国中世纪社会,它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后,从全局上说,到了20世纪,理所当然地要退出历史舞

台。但是,正如西方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保存着永恒的学术生命力一样,中国古典史学也是永远保留自己的魅力。如中国史学中的借鉴思想、富有辩证法的历史通变思想、论历史兴衰的民本思想、史学经世思想,在近代史学中以不同形式继承下来。历史编纂学中丰富的编纂形式,同样是我们应当经过批判继承而加以利用的珍贵遗产。一个明显例子是20世纪后期,白寿彝先生领导当代中国学人完成的多卷本《中国通史》。除了思想内容外,这部著作采用的新的综合体裁,就是在批判吸收中国纪传体史书体裁的长处的基础上形成的。

可以预料,新世纪的史学在各个方面将得到更大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复兴包括了中国古典史学的复兴。这个复兴当然不是回归到古典史学的原点,而是在经过扬弃,吸收精华后,来一个大发展,体现出时代特点,成为有民族特色的新史学。

——新考据学形成,反映出史学思想的变化。近代考据学与中国古典史学中的考据学有联系又有区别。古典史学与近代考据学都追求证实,但近代考证学较之传统考据学,不尽相同。新考据学吸收乾嘉传统史学考据方法论精神,又吸收了西方的史学方法论,而有新的创造。以王国维为例,他是在民族传统史学的土壤中进行创造,开辟新的领域,推进前人的研究,以开阔的文化史眼光认识史料,结合近代考古学成就,进行考史,从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二重证据法。

在总结近代史学发生的变化时,有一个问题要提出来。这就是吸纳多于创造,创新不足,没有在批判吸收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思想基础上,形成有民族特点的历史哲学,它影响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这个教训,我们应当深长思之。

另外要谈到的,是五四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大势。洪

认清注意到我在一篇文章^[1]中表明的观点。这里要再多说几句。五四以后到建国前，中国近代史学是多元史学交错在一起，而两种新史学的先后交替体现出近代史学的走向。一个是20世纪初年的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一是五四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形势下，外国新学理传入中国，中国史学发生新的变化，出现了新史学思潮：

——提倡民史，反对君史；提倡进化论，反对历史循环论、历史倒退论。

——提倡新体裁，反对旧体裁；摒弃了旧史学的所谓的史法、史例。

——提倡社会文化史、反对单一的政治史的史学格局；提倡用明白易懂的语体撰写史书。

1902年梁启超写《新史学》，打起“史界革命”旗号，在进化论基础上，系统阐发了他的新史学理论。因此，《新史学》成为他近代新史学开始的标志。到五四时期，他从欧洲考察回来后，在新文化运动高涨的情况下，不再坚持当年提倡的新史学理论，反而开始对当年提出的新史学理论进行“忏悔”，重新拾起历史循环论。他以新康德主义观点为依据，提出历史的“两系说”；以佛学的因缘互动说解说历史因果，提出心力造史说。20年代前后，梁氏史学思想的明显倒退，颇具有代表性。曾几何时，20世纪初年史界革命中不少勇士，到了20年代，不再坚持自己当年的主张，乃至否定自己的观点，也有一些人，则在困惑中向佛学

[1] 详见拙作：《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载《吕振羽研究文集》，中共中央出版社2002年版。

靠拢。

而在这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产生了,并且在曲折斗争过程中,到了三四十年代,成为史学的主流,出现一批研究中国古史、中国近代史、中国通史、社会史、民族史、思想史的大著作。无论在史料运用上,在对历史的解喻上,对历史前途的认识上,对当代社会的观察上,这些著作都体现出鲜明的特色。另外,相当多的史学家包括当年受到实用主义影响的史学家,都在向唯物史观靠拢;有的接受了唯物史观,并用以指导自己的历史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地上有延安地区的史学、国统区的史学以及沦陷区的史学,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代表了近代史学发展的方向。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延安地区史学家努力工作,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成为观察民族运命、争取民族光明前途的理论武器。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们从中国实际出发,挖掘民族精神,显示史学独有光彩,这些成绩是不能以某些不足、缺点而轻易加以否定的。

本卷基本上反映出这一时期的历史大势和史学走向,钩勒出史学发展轮廓,特别是在延安地区史学的研究上显出功力。认清潜心学术,孜孜不倦,有时几乎是终日不下计算机,终于写出专书,突显出了当时史学的亮点。本卷又注意研究孙中山的史学思想,是有见地的。对于一本著作来说,还是集中写自己的心得为好,嘎嘎乎难哉,独断之学也!

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问题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已经被提出来了。新世纪史学如何走?读之者,会有更多想法,会有更新的意见,我们期盼着。

目 次

作者简介

题 记	(1)
导 言	(1)
第一节 史学近代化和新史学	(1)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新趋向	(21)

第一编

绪 言	(51)
第一章 李大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者	(53)
第一节 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和史学理论	(53)
第二节 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研究特色	(65)
附:孙中山与史学	(78)
第二章 二十年代的史学思潮(上)	(99)
第一节 瞿秋白:系统宣传辩证唯物论的先驱者	(99)

第二节 李达的历史理论和史学思想.....	(112)
第三节 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和革命史研究.....	(129)
第三章 二十年代的史学思潮(下).....	(144)
第一节 西学与梁启超晚年史学思想的演变.....	(144)
第二节 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及其史学方法论意义	
.....	(174)
第三节 近代“疑古”思潮和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	
.....	(190)
第四节 何炳松对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传播	
.....	(207)
第五节 吕思勉的治史特色和史学理论.....	(222)

第二编

绪 言	(245)
第四章 毛泽东的史学思想	(247)
第一节 毛泽东关于史学工作的理论及其 史学研究方法论	(247)
第二节 毛泽东的历史理论	(264)
第三节 毛泽东对中共党史学学科理论的探讨	(276)
附：延安史学和延安的干部历史教育	(289)
第五章 郭沫若的史学思想	(317)
第一节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唯物史观 研究中国古史的开山之作	(317)
第二节 郭沫若的历史人物评价观	(334)

第六章	三四十年代的史学思潮(上).....	(354)
第一节	范文澜的治史路径和贡献.....	(354)
第二节	吕振羽在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中的学术创新	
		(375)
第三节	翦伯赞的历史哲学.....	(391)
第四节	侯外庐对中国历史的民族特点的研究.....	(405)
第五节	何干之的社会经济史及思想史研究.....	(423)
第七章	三四十年代的史学思潮(下).....	(449)
第一节	陈寅恪的文化史理论及治史方法.....	(449)
第二节	陈垣的史学研究中的民族性特点.....	(468)
第三节	钱穆的文化史学.....	(484)
本卷主要引用书目.....		(504)

导　　言

第一节 史学近代化和新史学

所谓新史学是指在外来学术思想影响下出现的,反映近代社会特点的史学。它既与传统史学有密切联系又有显著不同。20世纪中国历史学近代化过程中,求“新”是各个学派的共同追求。回顾一百年的历史学发展,从总体上说,先后出现过两种新史学:一是20世纪初出现的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一是五四以后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这两种新史学联系起来,大体反映出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历程,明显地体现出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特点。^[1]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代表了中国史学的新方向,在近代史学的发展中,逐渐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故本书另辟一节进行论述。本节所说的新史学潮流,特指20世纪上半期,在西方学术思潮影响下,由梁启超始发其端,经过不断延

[1] 吴怀祺:《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见《北京档案史料》2001年第1期,233页,后收入《吕振羽研究文丛》(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5月版)。

伸、分化而形成的史学思潮。

一、新史学的发展历程

1、第一阶段：20世纪初年到新文化运动，新史学的发轫时期

中国传统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它日益显现出保守性与封闭性。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动时代，传统史学出现了某种变革：“经世”史学兴起，史学与社会改革、挽救危亡、反对侵略联系在一起，其具体表现是外国史地研究受到重视、当代史著述增多等等。社会的剧烈变动，还引起了历史观的变化。19世纪末，严复引进西方的进化论，大力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学从经世史学向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近代史学转变。19世纪后期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及其特点，大致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封建史学日趋衰落；另一方面是，爱国学者利用外国历史资料作为揭露和反对外国侵略斗争的工具。资产阶级学者初步提出对封建史学的批判，开始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为后来20世纪初期建立新史学的活动拉开了序幕。^[1]

新史学的奠基人是梁启超。他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吸收外国史学理论，尤其是日本学者浮田和民在《史学通论》一书中所阐述的史学理论，构建起新史学的理论体系。1901年至1902年，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高举“史界

[1] 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革命”大旗，开新史学之先河。

20世纪初，梁启超表示了与传统史学彻底决裂的决心。1902年，在《新史学》一文中，他对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批判。他尖锐地指出，封建史学存在“四弊”、“二病”。“四弊”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他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如何革除旧史学的“弊”与“病”呢？梁启超说：“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1]在梁启超看来，新史学与旧史学不同，它不是以王朝更替和一姓兴衰为研究对象，而是以历史进化论学说为指导，“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求得其公理公例”。应该指出，梁启超对封建史学的批判有一定的片面性，没有肯定其中的积极因素。但在当时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史学界，其言论的确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对于破除对封建史学迷信，解放思想，产生了重大作用。附带指出，20年代，梁启超的进化论史学思想在某些方面有所倒退。1922年，他撰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以求得因果关系为导引，对《新史学》中关于历史的概念作了修正。他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2]这里，他将

[1]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6、10、8页。

[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进化现象”改为“赓续活动之体相”，以人类社会的“赓续”修正了他以前所提出的人类社会是进化的观点，抛弃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个灵魂。当然，这一时期梁启超对进化史观的历史进步性还是肯定的。他说，达尔文花费数十年时间，著书数十万言，“结果不过诒吾辈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大字而已。然试思十九世纪学界中，若少却此八个大字，则其情状为何如者？”^[1]

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新史学诞生的宣言书。20世纪初期，新史学开始起步。这一时期的“新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提倡历史进化学说。章太炎也论述了新史学的宗旨和功能，为新史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主张改革旧史学，强调著史的宗旨在于标明社会的发展进化。1902年，他致信梁启超，提出通史之作有两方面的宗旨，一方面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的原理为主，一方面以鼓舞民气、启迪方来为主。刘师培也是新史学的积极倡导者。1905年，他编写了一部《中国历史教科书》，以历史进化观点叙述了汉族与其他各民族的关系以及各民族在政治、伦理等方面的进化情况。屠寄于1903年至1904年间执教京师大学堂时所编的《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编著宗旨即是阐明“草昧以来人群进化之理”。屠寄尝试运用历史进化观点解释中国古代历史，这是对传统史学的大胆突破。^[2]

[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81页。

[2] 参见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88页。